

CLASSIC
现代学术
经典精读



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

主编 李伯谦 陈星灿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

主编 李伯谦 陈星灿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 / 李伯谦, 陈星灿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04-051679-1

I. ①中…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2472号

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

ZHONGGUO KAOGUXUE JINGDIAN JINGDU

策划编辑 梁宝贵
插图绘制 于博

责任编辑 包小冰
责任校对 马鑫蕊

封面设计 李小璐
责任印制 毛斯璐

版式设计 马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41.75
字数 83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5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1679-00

审图号: GS(2018)2255号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指》，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都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才能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其专业知识，而且在于在潜移默化中使其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有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绪言

考古理论、方法

015 / 李济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031 / 梁思永与《小屯、龙山与仰韶》

047 / 尹达与《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

064 / 夏鼐与《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073 / 苏秉琦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087 / 佟柱臣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111 / 童恩正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旧石器考古

151 / 裴文中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

176 / 贾兰坡与《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

193 / 吕遵谔与《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瞻望》

229 / 张森水与《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新石器考古

249 / 石兴邦与《黄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

267 / 安志敏与《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

283 / 汪宁生与《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

304 / 李仰松与《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

320 / 严文明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343 / 张忠培与《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墓地的若干分析》

青铜时代考古

389 / 徐旭生与《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407 / 郭宝钧与《浚县辛村》(节选)

415 / 石璋如与《殷代的弓与马》

445 / 高去寻与《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义之推测》

467 / 刘敦愿与《饕餮(兽面)纹样的起源与含义问题》

481 / 安金槐与《再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

495 / 邹衡与《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504 / 郑振香与《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

522 / 张光直与《中国青铜时代》

秦汉及以后时期考古

547 / 冯汉骥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583 / 宿白与《武威行》

608 / 王仲殊与《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

627 / 黄展岳与《汉代的褻器——兼论“虎子”问题》

645 / 俞伟超与《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

656 / 出版说明

绪 言

我们所说的考古学不是宋代即形成的传统金石学，而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19世纪中叶首先从欧洲兴起，随着开矿山、修铁路，经常有文物出土，为了科学地发掘和整理这些文物，借鉴地质学的地层学、古生物学的分类学，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理论方法的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

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到中国肆意调查、发掘古遗址，劫掠古文物，刺激了有爱国之心的中国学者；二是在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现的疑古思潮对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否定，促使学术界产生“走考古学之路”重新研究中国古史的要求。以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考古学研究室、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国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并设立考古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为标志，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其发展过程考察，以1949年为界中国现代考古学可分为两个时期七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包含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初创和初步繁荣阶段。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和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最早开

始的田野考古工作；1928年至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在殷墟的发掘，以及同时期地质调查所在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发掘，史语所考古组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日照两城镇，河南浚县大赭店、浚县辛村、辉县琉璃阁等地的发掘，施昕更在浙江杭州良渚的发掘，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等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北大考古学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的发掘，均取得重要成果，开创了初步繁荣的局面。

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发掘，发现多个直立人头盖骨化石和种类繁多的现已灭绝的鬣狗、剑齿象、肿骨鹿等动物骨骼化石，证明直立人在中国的存在和中国也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在城子崖、两城镇、大赭店和良渚的发掘，分别发现了以黑陶、灰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种种臆猜；浚县辛村、辉县琉璃阁、易县燕下都的发掘、发现周代封国遗存，开启了周代考古的先河。殷墟的发掘，则发现了大批商代甲骨刻辞、宫殿基址、商王陵墓和青铜器、玉器及冶铸、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将商代晚期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不仅有许多重要发现，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以李济为首的，包括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刘耀（尹达）、高去寻、夏鼐、苏秉琦等在内的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小屯、龙山与仰韶》和苏秉琦的《瓦鬲的研究》分别标志着作为现代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在中国的成熟。

第二阶段，从193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停止，机构瘫痪，人员离散，资料转移甚或丢失。但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仍有不少学者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本职工作，史语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的资料辗转迁移途中仍不忘整理研究出版考古成果，并与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既做调查又做发掘，尹达到延安参加抗战，仍抽时间调查遗址，用考古材料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第二个时期，含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共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1949年至1965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原史语所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去了台湾，他们继续整理殷墟发掘资料，参加一些台湾地区遗址的调查发掘，还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招收培养考古人类学学生。原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郭宝钧、夏鼐等则留了下来，和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留下来的徐旭生、黄文弼、苏秉琦等于1950年重组成立了考古研究所，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当年即由郭宝钧带队重赴殷墟发掘

安阳西北冈武官村大墓，同时展开了河南辉县的发掘。

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人才奇缺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累计培养了400余名考古人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在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支持下于1952年创办了考古学专业，首次在大学招收考古学本科生，其后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考古学专业，招收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补充到各地各级文物考古机构。

这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化石。新石器时代有江西万年仙人洞，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元君庙、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遗址；新发现新命名的有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等。青铜时代有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河北邯郸涧沟、邢台曹演庄，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河南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南长沙楚墓等；秦汉以后有河南巩县铁生沟、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陕西西安灞桥汉墓出土纸张，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和东西两市、大明宫麟德殿及含元殿遗址等。基于重要发现而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新石器时代有安志敏主笔的《庙底沟与三里桥》、石兴邦主笔的《西安半坡》、张云鹏主笔的《京山屈家岭》；青铜时代有安金槐主笔的《郑州二里岗》，郭宝钧、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等主笔的《辉县发掘报告》，张长寿主笔的《沔西发掘报告》，苏秉琦等主笔的《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秦汉及以后时期有蒋若是主笔的《洛阳烧沟汉墓》、宿白主笔的《白沙宋墓》等。其中，《沔西发掘报告》依据墓葬随葬品组合及器物形制、花纹的变化，将西周墓葬分为从成康至西周晚期连续发展的五期，初步建立了宗周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的标尺；《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结语”部分依据墓葬随葬品组合和器物形制变化，将从春秋初期至战国晚期的墓葬分为七期，继而考察了各期之间变化的大小，发现三、四期之间的春秋、战国之际是发生重大变革的阶段，从而将考古年代学研究上升到了分析社会结构变化的高度；《洛阳烧沟汉墓》是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汉墓结构形制变化和分期的代表性作品，其关于铜镜、五铢钱的型式编年系统至今仍为汉代考古研究者广泛参考和使用；《白沙宋墓》是将考古学研究与历史文献研究密切结合的典范，素为学界所推崇。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撰写报告的实践，锻炼了研究者，从中涌现出了安金槐、蒋若是、麦英豪、李京华、蒋赞初、张云鹏、王

劲、朱伯谦、牟永抗、李逸友、高至喜、周世荣、张学正、赵生琛、邹衡、俞伟超、郑振香、刘观民、黄展岳、马得志、吴汝祚、高明、黄景略、郑笑梅、张忠培、张森水、王克林、徐莘芳、张长寿等考古学家。在综合研究方面，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和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最受瞩目，前者根据仰韶文化的诸多发现，对其分期、类型、特征、分区、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后者依据地层关系、器物形制、花纹变化首次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树立了殷墟分期的标尺。这两篇论文内容富有新意，是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研究文化遗存的代表作，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学科建设问题上，夏鼐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尤为重要。针对当时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他引入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提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按照惯例，通常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予以命名，规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极大地推进了研究的深入。

第四阶段，1966年至1976年，考古基本处在停止状态。“文化大革命”初期，《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被迫停刊，大学考古学专业被迫停止招生，各省文物考古机构人员下放，考古工作停滞不前。由于基本建设还在进行，此时期除了引起轰动的河北保定满城汉墓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还有一些重要发现，如旧石器时代有：湖北郧县人化石、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山西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新石器时代有：陕西临潼姜寨，河南郑州大河村，山东邹县野店、胶县三里河，江苏吴县草鞋山，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北宜都红花套，四川巫山大溪，青海乐都柳湾，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青铜时代有：陕西宝鸡西畴国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楚都纪南城，江西清江吴城，河南罗山蟒张，山东益都苏埠屯、济南大辛庄、临淄河崖头，河北定州北庄子，北京房山琉璃河，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等；秦汉及以后有：陕西咸阳秦都、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桂宫、杨家湾汉墓、汉宣帝杜陵、乾县唐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西安唐长安兴化坊金银器窖藏坑，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元大都等。这些发现和围绕着这些发现所写的发掘简报、报告及研究文章填补了考古学发展史上的缺环。这个时期综合研究难以开展，成果稀缺，除了张颢的《侯马盟书》，几乎没有重要的考古报告和论著问世。“文化大革命”后期，考古活动逐渐恢复。1972年文物出版社在南京举办“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研讨

会”，突破长期的思想禁锢，一改沉闷的学术空气，活跃了大家的思想；1975年苏秉琦在吉林大学所作的题为《学科改造与建设》的报告，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提出作为我国今后考古工作一个重要课题的开展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指导方针，为下一阶段考古工作的活跃勃兴做了舆论准备。

第五阶段，1978年至1985年，是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对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学术的繁荣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召开了考古学规划会议，制订了1978—1985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课题，确定以中国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和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为工作和研究的重点。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从历史系分出独立成系，标志着考古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开始，自此许多高校的考古学专业相继成系，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在学术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同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发表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演讲，认为二里头遗址反映的面貌可以看作中国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1984年，苏秉琦在辽宁朝阳考古座谈会上提出了文明起源、国家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路线，他说：“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将有利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①这一研究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与以前生搬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教条、硬套苏联把考古学简单理解为物质文化史经验路线的彻底决裂。在苏秉琦这一研究路线指引下，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发展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发表的众多论著中，严文明的《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一文，提出龙山时代是由原始氏族社会向文明国家社会过渡的时代的观点，影响甚大。1984年，考古学对外开放的重大事件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来华讲学。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简洁而精辟地介绍了北美考古界流行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聚落考古、行为考古、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以及文明演进模式理论等，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张光直成功架起中国考古学界与世界考古学界学术交流的桥梁。

^①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举例如下：新石器时代有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群，湖北天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及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青铜时代有河南偃师商城，陕西周原遗址及青铜器窖藏，山西曲沃晋国早期都城遗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秦汉及以后有陕西咸阳秦都咸阳宫殿基址、江苏高邮天山汉墓等。这些考古发现为构建中国古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提供了素材，为阶级、国家起源研究提供了物证。

这个时期出版的综合研究专著有苏秉琦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邹衡的《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俞伟超的《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他提出的建立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设想和包括建设田野考古基地在内的考古事业建设的建议，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and 学科建设，均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邹衡的《商周考古》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专业教材，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殷墟发掘以来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对商周考古领域问题的见解；《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是邹衡关于夏、商、周文化的力作，分析深入，论证严密，代表了当时该领域最高研究水平。俞伟超的《先秦两汉考古论集》选收了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共 20 篇论文，其中《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是其各论述领域分析最为细致精到、最具代表性的论文。

第六阶段，1986 年至 1995 年，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以文明起源为中心的学术讨论分外活跃。

这个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考古有：湖北郧县直立人化石产地、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面及石器制作场，江苏南京汤山直立人化石产地等；新石器时代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城头山城址及稻田，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瑶山、汇观山祭坛、莫角山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河南孟津妯娌遗址、辉县孟庄城址，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青铜时代有：河南殷墟郭家庄 160 号大墓、殷墟花园庄甲骨窖藏、平顶山应国墓地、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三门峡虢国国君墓，河北定州北庄子商代贵族墓地，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长清仙人台郭国墓地，江西瑞昌商代铜矿遗址，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太原金胜村春秋晋国赵卿墓，北京军都山山戎墓地等；秦汉

及以后有：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等。其中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和两广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是较早确认的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澧县稻田是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稻田，江西瑞昌铜矿是迄今确认的可早到商代中期的铜矿，这些发现都改变了以往的认识。

这个阶段出版的考古报告有《曾侯乙墓》《北京大葆台汉墓》《侯马铸铜遗址》《宝鸡强国墓地》《上马墓地》《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等。

在综合研究方面，严文明的《仰韶文化研究》对仰韶文化的分期、源流、类型、社会发展阶段、与其他文化关系做了深入分析，是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来最为重要的一部研究著作。除此之外，其他研究则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最为集中，苏秉琦、田昌五、佟柱臣、安志敏、邹衡、严文明、吴汝祚、张忠培、李绍连等先后著文、参与讨论，内容涉及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标志、文明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文明形成的时间等问题。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和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等论文影响甚大，其中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一体模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考古》杂志主编徐苹芳的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召开了文明起源座谈会。会后，课题组成员分赴各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学术考察，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91年正式召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会期长达13天，会上既有对重要遗址的进一步考察，也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与讨论。苏秉琦应邀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第七阶段，1996年至今。考古学科地位明显提升，体现考古成果的考古发掘报告加速出版面世，客观忠实报道发掘资料成为这一阶段考古报告一大特色，理论方法探讨日趋活跃，科技手段普遍采用，考古学参与的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研究主流，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日益密切，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公众考古渐次受到重视。

这一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时间来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从地域来说，几乎涵盖了各个省。

考古报告成倍增长，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考古系列报告基本出齐，南水北调工程